

大国追赶的经济学观察

理解中国开放宏观经济 (2003—2013)

(上)

*Reflection on Economic Catch-up by a Large Country: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Open Macro-economy (2003-2013)*

卢 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

大国追赶的经济学观察

理解中国开放宏观经济 (2003—2013)

(上)

*Reflection on Economic Catch-up by a Large Country: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Open Macro-economy (2003-2013)*

卢 锋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追赶的经济学观察:理解中国开放宏观经济:2003—2013:全2册/卢锋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4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
ISBN 978-7-301-24071-7

I. ①大… II. ①卢… III. ①中国经济-宏观经济-研究-2003—2013
IV. ①F123.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3505号

书 名: 大国追赶的经济学观察——理解中国开放宏观经济(2003—2013)(上、下)

著作责任者: 卢 锋 著

责任编辑: 姚大悦 兰 慧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071-7/F·392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子 信 箱: em@pup.cn QQ:552063295

新 浪 微 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经管图书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68印张 1257千字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68.00元(上、下)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总序

自2004年首次亮相以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已经出版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者的二十余部研究著作。今年恰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出版新的一辑研究著作,可喜可贺。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及在其基础上于2008年成立的国家发展研究院致力于应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目标是既为经济学的发展添砖加瓦,又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出谋划策。作为中国第一个全部由海归学者组成的研究机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系统引进现代经济学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并在国内倡导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本土化指的是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规范化指的是应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国际化指的是采用国际通行的评价体系,参与国际对话。这种研究取向既不同于过去单一地依赖政治经济学来研究中国问题的做法,也不同于一些国外学者仅仅把中国作为一个研究样本的做法,而是全方位地应用现代经济学(包括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力图从中国的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经济学理论,并最终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国内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面向未来,中国经济学研究仍需要解决好以下两个关系问题:一是学术研究和现实关照之间的关系。目前的一个倾向是,一部分学者完全放弃对现实的关照,专注于做纯学术研究。这其中当然有专业分工的原因,但是,这种割裂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能是极为不利的。多数做纯学术研究的学者都只在国外发表他们的论文,然而,国外杂志未必对中国经济感兴趣,久而久之,中国学者在国外发表的论文就自然会脱离中国实际,甚至出现“投人所好”的现象。时下,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论文往往被认为是达到更高学术标准的标志,因此这种现象还有不断加强的趋势。但是,经济学毕竟是一门关注现实的社会科学,长期脱离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壤,中国学者是不太可能创造出世人关注的学术贡献的。中国正处在

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转型时期,这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素材,观察和研究当下的中国更可能产生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二是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与一部分学者放弃对现实的关照相反,另一部分学者则放弃学术研究,专注于政策研究。同样,这其中也有专业分工的原因,但是,如果没有学术研究做支撑,单纯的政策研究就可能变成无本之木。比如,在关于中美经济失衡的讨论中,美国的学者和政策研究者可以拿出“雄辩的”理论与证据,说明中美经济失衡完全是中国的过错,而中国的学者和政策研究者在多数时间里只有应答的份儿。究其原因,完全是因为中国的研究准备不足造成的。学者忙于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论文,政策研究者忙于解决政府迫在眉睫的政策问题,中间缺少了做中国中长期学术研究的人。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倡导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并由此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为中国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这个宗旨和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办院方针是一致的。国家发展研究院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机构,从事经济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并努力把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结合起来,成为在中国和世界上有影响的智库。“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家发展研究院学者学术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平台,这些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高度,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政策含义,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树立了一个榜样。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希望今后继续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014年3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序

2003 年笔者休学术年假去哈佛大学访学大半年,主要研究当代经济全球化与“产品内分工”问题。此后研究兴趣从早先侧重于粮食安全与农业经济,逐步转向较多关注中国开放宏观经济领域问题。回想起来,与成千上万农民兄弟离乡进城的转型潮流类似,笔者在经济研究内容选择上也经历了一次“农转非”。本书辑录了这段时期侧重于开放宏观经济的研究论文与报告。篇幅较长,分上、下册出版。

为什么愿意十余年持续研究本书内容涉及的广泛对象?这些论文报告之间有何内在联系?翻看文稿,思前想后,回答是新时期中国经济追赶提速在开放宏观经济与政策领域提出了许多具有认知挑战性的新现象与新问题,使任何愿意寻求理解的经济学家都难以无动于衷,一旦有机会思考与研究便欲罢不能。

—

近十余年中国开放宏观经济的表现非同寻常。宏观经济在走出世纪之交的通缩后,2003—2007 年持续五年以超过两位数的增速扩张,年均增速达到 11.7% 的高位。更为独特之处在于,中国宏观经济一反早先时期高增长通常面临本币持续贬值压力的扩张形态,稳定呈现出经济高增长伴随实际汇率升值的新格局。中国经济成长第一次出现以美元衡量的增速大大快于本币增速、名义追赶增速超过实际追赶增速的形势。

数据显示,1979—2002 年人民币衡量的 GDP 实际年均增速约为 9.6%,考虑 GDP 平减指数的名义年均增速约为 15.7%,然而由于同期人民币汇率从 1 美元兑 1.58 元人民币贬值到 1 美元兑 8.28 元人民币,美元衡量的经济总量年均增速约为 7.97%。2003—2013 年这一现象发生实质性转变:本币 GDP 实际年均增速为 10.5%,名义 GDP 年均增速为 15.4%,但是同期美元衡量的 GDP 年均增速达到 18.89%,是早先时期同一增速指标的 2.36 倍。现价美元衡量的 GDP 总量从 1978 年的 0.23 万亿美元,增长到 2002 年的 1.45 万亿美元,24 年的增量

为 1.22 万亿美元。2003—2013 年现价美元 GDP 从 1.64 万亿美元增加到 9.25 万亿美元,10 年的增量为 7.61 万亿美元。

中国经济追赶提速成为新时期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最重要的因素。美国金融危机前后,中国 GDP 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同时在工业增加值、国民储蓄、资本形成、外汇储备规模等宏观经济指标上跃居第一。与 2005 年前后认为 2020 年人均美元收入将达到 3 000 美元的推测观点不同,2013 年用汇率衡量的中国人均美元收入已超过 6 000 美元,2020 年可能会达到早先预测量的 4 倍。据 IMF 全球数据库信息估算,2000—2005 年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量的贡献为 8%,2005—2010 年提升到 21%,据估计这一贡献率在 2010—2015 年可能会达到 25%—30%。2003—2012 年用美元衡量的中国 GDP 年均增速比美国高出 13.8%,如不出意外,中国经济总量将在未来 10 年内超过美国,比 2003 年发表的著名“金砖四国”报告预测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点提前约 20 年。

中国经济追赶加速不仅是 21 世纪初世界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也是理解当今中国经济政治、国际关系以至社会生活演变的最重要的经验背景。无论是中美新型大国对话广度、深度加大与频次提升,还是周边经济政治关系发展与矛盾发酵;无论是中国消费者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和纽约第五大街扫货成“招牌现象”,还是中国企业在非洲以及世界各地投资飙升引发全球热议;无论是国内 PM2.5 和排放污染压力困扰加剧,还是电视军事节目和网络军迷人数大幅增长;亦无论是 2009 年铁矿石谈判陷入僵局与力拓公司案件东窗事发,还是近年 NBA 前明星马布里成为北京金隅队“政委”并拥有无数北京球迷粉丝……这些似乎不相干的现象其实跟中国经济追赶这一基本事实都有直接和间接联系。

中国经济追赶带来前所未有机遇的同时也派生出新的矛盾与张力,在开放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领域带来一系列始料未及的全新问题与挑战。回望过去十多年的宏观经济史,当经济追赶与“胡温”景气依照其自身逻辑在 2003 年逐步展开时,上述矛盾张力开始通过短期宏观经济失衡现象表现出来:瓶颈部门紧张,通胀压力渐起,投资与出口双双高增长使总需求增速偏快,货币信贷与房地产等行业超常扩张显示经济过热风险。世纪之交多年景气低迷背景,使 2003 年快速展开的开放宏观景气与通胀压力平添几分突兀,“非典”冲击与围绕央行“121 文件”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争论使得如何判断当时的经济形势更显扑朔迷离。

宏观经济偏快偏热判断到 2003 年年底逐步达成共识,信贷、货币、供地、投资等紧缩宏观调控政策渐次推出,其中针对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部门的投资管制政策在新一轮宏观调控政策中的作用尤为引人注目。虽然宏观经济运行的某些关键指标在 2004 年年初显示上年紧缩政策已初见成效,2004 年 1 季度钢铁投

资以及总投资同比增长率仍在增长,推动政府出台以暂时冻结建设用地供应、查处“铁本事件”为标志的更为强势的宏观调控风暴。宏观经济后续运行经历2007年前后新一轮通胀、2008—2010年间大幅V形波动以及2011年以来增速减缓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经历紧缩—刺激—紧缩—稳增长多轮转换调整,不过2003—2004年宏观调控实践意义深远,尤其是2004年宏观调控风暴呈现的宏观调控工具多样化与产业政策宏观调控化特点,在随后一段时期相对稳定地延续下来。

二

新时期开放宏观经济与政策领域的诸多新现象、新问题和新矛盾,引发学界和媒体的空前关注与讨论。例如:怎样理解消费率下降和投资率上升现象及其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如何解释前所未有的外部顺差现象以及如何看待汇率及各种结构因素的作用?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对于宏观经济运行有何影响?外汇储备规模空前增长的原因何在?什么是社会融资结构快速变化和影子银行扩张的驱动原因?新时期通胀的货币扩张机制与物价表现有何特点?如何看待扩大就业政策与民工荒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和评估“四万亿”一揽子刺激政策?如何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由于中国开放经济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以及国内外学术与信息交流的扩大加强,有关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析与争论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国外学界和业内人士的关注,越来越成为全球范围的议题。

我们把有关新时期开放宏观经济错综复杂的探讨争论归结为三方面相互联系的问题。一是在外部关系方面如何看待汇率与外需,二是在内部增长机制方面如何看待投资和内需,三是在政策方面如何看待产能过剩与产业政策宏观调控化。考察流行观点对上述三位一体问题的认知特点及内在联系,有助于梳理揭示主流宏观经济分析模式以及宏观调控政策的逻辑结构,为在反思、厘清主流认识结构基础上加深理解中国新时期开放宏观经济规律提供启示。

首先是汇率升值问题引发最为热烈的争议。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提速及相对发达国家的持续追赶,逐步对人民币汇率引入升值压力。虽然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贬值预期暂时抑制了人民币升值趋势,21世纪初危机化解后中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累积效应加大了本币升值压力,表现为2003年开放景气增长展开的同时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快速扩大。由于种种原因,在是否重回1994年汇率体制改革确立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问题上产生争议,汇率政策在2005年7月汇率体制改革前钉住美元,此后央行意在释放汇率升值压力的举措仍困难重重。国内经济学界和媒体就汇率政策展开讨论,同时吸引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和评论,成为中国

单个经济政策在全球曝光最为广泛、深入的议题。

虽然中国早在1994年已确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新时期容纳升值趋势仍面临多方质疑。美欧呼吁人民币升值诉求引入政治敏感因素,货币战争观点和阴谋论在社会上一度流行对必要政策调整产生制约作用。研究人员阐述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美国问题,强调增加外汇储备好处多多,或认为货币升值不能调节贸易失衡,这些观点本身有学术探讨意义,然而在特定语境下也会增添汇率政策调整的复杂性和困难。从国内宏观经济角度看,质疑升值论能相当程度上影响政策,其分析逻辑其实仍建立在假设汇率升值对顺差具有调节作用的基础上,使决策层担心升值抑制经济增速并对就业带来不利影响,“稳定汇率是为了保就业”成为质疑汇率的潜在最有力理由。就宏观经济分析与政策选择而言,汇率问题争议的实质在于如何看待内需增长能力。换言之,严肃的升值怀疑论在逻辑上应以某种形式的总需求不足特别是内需不足隐含判断为基础。

其次是如何看待国内投资的争论。内需由消费和投资组成,中国消费增长其实相当快,然而伴随着储蓄率的提升,投资增长更快,评估内需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投资。从经济学说史上不同学派经济发展理论看,或从近现代不同国家工业化、城市化高速推进阶段投资率峰值动态提升角度看,一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伴随高投资总体上属于合规律现象。然而,在中国特定体制转型背景下,高投资伴随宏观经济偏热,尤其是较多领域政府主导投资存在各种弊端,另外,大国投资发力加剧环保压力,如何看待高投资成为宏观分析争论的焦点。

高投资现象受到各种质疑。流行观点有时将投资驱动看作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症结所在,甚至认为高投资是“自掘坟墓”。这类批评在具体场合可能是针对政府过多干预投资的现象,或强调利率、环境、土地等方面的价格扭曲导致投资效率低下,这类批评观点具有合理性。不过质疑观点有时也会发展为简单否定高投资、主张依赖消费的增长模式。国外一些专家和机构在评论中国经济时似乎特别偏好消费增长模式。如有外国著名投行专家多年孜孜不倦地呼吁“中国应把经济增长的侧重点转向消费”,宣扬“消费型中国方能持续发展”,最近更倡导“现在是美中两国互换身份的时候了:美国应该将重点从消费转向制造,中国则相反”。这类观点其实有待商榷。

质疑投资与质疑升值似乎互不关联,其实二者隐含着内在联系。质疑汇率升值论观点潜在假设中国内需不足,这与中国投资和消费双双快速增长的事实并不一致。然而,如果中国投资不仅存在体制扭曲等可以通过深化改革加以矫正的问题,而且高投资自身注定不合理,那么内需不足与出口优先就得到逻辑支持,升值怀疑论顺理成章地获得依据。因而,简单否定高投资客观上会与升值怀疑论联手结盟,又会通过极具特色的产能过剩分析范式为中国式宏观调控解决

方案做潜在逻辑铺垫。

最后是如何看待产能过剩与中国式宏观调控。经济分析的产能过剩概念,原意主要指工业部门产能利用率偏低或闲置率偏高。市场经济下不同部门在进入壁垒、竞争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合理产能利用率标准不同,宏观经济周期运行不同阶段产能利用率会顺周期变动,另外,开放经济成长过程中特定行业由于比较优势变化发生退出转移也会伴随产能过剩,因而产能过剩是竞争性市场环境下的常态性现象。除了重要行业一次性退出调整伴随产能过剩或需产业政策适当救助之外,产能过剩作为一种市场竞争现象主要应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化解。不同于在总量指标基础上定义的“GDP 缺口”属于常规宏观分析概念,局部范围或特定行业的产能过剩对宏观分析仅有辅助性意义。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盛行体制性短缺而罕见产能过剩。世纪之交的通缩与国企改革伴随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压力加大,从产能过剩角度解释当时的通缩现象成为一种重要观点,此后产能过剩成为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常用概念,并对政府有关部门实施干预投资政策提供较多分析支持。观察新时期的宏观调控情况,宏观调控部门可以借助产能过剩分析逻辑,从不同方向干预社会投资。在宏观经济不景气与产能利用率偏低时,宏观调控部门在加大政府直接投资力度的同时,仍可能会基于“过去高速投资带来产能过剩”的分析逻辑抑制特定行业的社会投资。在经济偏热的通胀阶段,又可能基于“高投资将导致未来产能过剩”判断打压某些部门投资。在宏观经济周期运行的不同阶段,产能过剩命题可能左右逢源,为产业政策宏观调控化干预与宏观调控工具多样化选择提供分析支持。在这一背景下,如何看待产能过剩概念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作用?如何认识市场机制与产业政策调节产能过剩的功能?宏观调控部门以产能过剩为名干预企业投资是否合理?这些成为宏观经济和政策分析争议的问题。

对于上述三方面的问题,人们在相关讨论中可能认同不同观点并采取不同立场,然而,有关这些问题的流行或主流观点客观存在隐性联系,从而形成三位一体的命题。部分源自对世纪之交通缩短期特例的深刻印象,我们对总需求特别是内需增长信心不足,过于强调汇率稳定保外需,结果在生产率追赶背景下引入汇率动态低估。新时期宏观经济实际的总体特点是投资高增长和总需求较快扩张,总需求不足观点与基本经验事实其实不符,然而,质疑高投资客观上具有质疑内需可靠性的含义,从而间接迂回地为汇率浮动怀疑论提供支持。中国高投资现象背后确有扭曲因素,亟须通过深化改革搞对价格并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加以矫正,然而,简单否定高投资,或侧重于从产能过剩角度批评高投资,则为利用过多产业政策管制投资提供了依据。

可见,流行观点包含几个相互联系的命题:高投资导致产能过剩不可持续,

需用产业—宏观调控政策管制投资;由于内需不可靠与总需求不足,因而外需作用极为关键;稳定汇率避免升值是争取外需保增长的必要条件。这个三位一体的命题构成的闭合性推论链条,成为一段时期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观调控政策设计的隐含逻辑结构。反思探讨这个逻辑结构的合理因素与偏颇局限,有助于全面认识新时期中国开放宏观经济运行的真实机制与内在规律。

三

本书的内容是在观察新时期中国开放宏观经济基本事实特征与参与宏观经济和政策讨论过程中探讨形成的。为便于读者了解和批评,可将主要内容归结为十点看法。

第一,长期不缺总需求。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句话:长期经济增长由潜在供给能力决定,短期经济波动由总需求变动决定,宏观政策调节总需求使之接近潜在总供给。分析短期宏观形势无疑需高度重视总需求变动,然而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由供给面因素决定,总需求不再是基本约束条件。潜在供给扩张由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调整在内的社会生产函数结构因素所决定,中国经济发展以其特有的转型内涵凸显制度创新的最为关键的意义。农村改革一举解决困扰计划经济几十年的温饱问题,特区开放利用当代全球化产品内分工的时代特征条件搞活经济很快收效,世纪之交改革开放重大突破奠定了 21 世纪初开放景气基础。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源泉在于通过深化改革并助推社会生产函数结构变化提升潜在供给能力,而不能指望密集出手与频繁变更政府宏观调控。

第二,汇率升值趋势是生产率追赶的内在要求,中国转型环境下人民币先贬后升具有规律性。中国对外开放最初的十几年,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相对追赶不明显,加上要消化计划经济时期汇率高估和价格管制扭曲,人民币呈现间歇性贬值趋势。近二十年来中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逐步发力,通过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派生出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全面考察生产率追赶的阶段性变化,开放早期汇率高估的初始条件,以及不同阶段经济内外环境变化的特定因素,人民币汇率先贬后升趋势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故事。新时期中国经济实践的经验表明,中国作为大型开放经济体,通过深化改革搞对汇率这个开放经济最基本的价格,对宏观经济具有全局性意义。忽视这个规律要求,过于强调汇率稳定会导致汇率动态低估,客观上不利于开放市场经济结构调整即宏观经济稳定。

第三,要重视发挥城市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城市化规律首先表现为城市以其特有的集聚与规模效应持续提升经济供给面效率,同时城市化所集

聚的非农产业以其更高的收入需求弹性创造源源不断的需求增长点。城市化转型期无疑应高度重视农业增长、农村繁荣、农民福利等三农问题,发挥农业对大国经济发展的特有支持作用,然而,应立足于通过推进城市化、工业化为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创造条件,而不宜预期农民长期滞留农村与农民工年老返乡来回避和延缓城市化进程。因而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与农地制度改革,突破计划经济城乡分割体制这两个最后的堡垒,在财产、居住和择业方面赋予农民充分的公民权。要全面理解农业部门的经济属性,防范落入农业补贴保护体制陷阱并妨碍实现完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

第四,中国高投资率具有合规律性,但是亟须深化改革消除影响投资的体制扭曲因素。投资放弃了部分收入用于现期消费,然而能创造更多收入以支持未来更高消费,因而投资与消费并非对立。不同国家的合理投资率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结构等条件,并不存在绝对标准。如同发育长个的年轻人饭量较大一样,快速增长阶段经济体投资率较高合乎规律。中国现阶段有能力利用自身的高储蓄推动高投资,是经济能够较快追赶并逐步收敛的关键条件。但是同时要看到,由于体制转型尚未完成,中国高投资存在多方面的问题。如土地、汇率等要素价格扭曲刺激投资过度冲动,政府过多直接干预投资容易造成扭曲,另外,大国高投资加剧排放压力提出增长与环保目标之间的取舍难题。评估投资的根本指标是效率而非速度。投资若受机制与价格扭曲支配,即便低速增长也不可取;若能消除扭曲并保证真实回报高于真实成本,则较高投资也无妨。关键是要深化改革、搞对价格、扩大准入、减少管制,并在此基础上让市场决定均衡水平投资。

第五,开放发展破解大国就业转型难题。中国的经济发展承载着将几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岗位就业的艰巨使命。20世纪末国企改革突破使得计划经济体制隐性失业明显化,出现下岗失业压力急剧增加的严峻形势。世纪之交的改革开放突破与宏观通缩孕育了21世纪初经济的强劲增长,推动就业转型取得多方面的进展。2003—2012年间中国非农就业增加1.43亿人,农民工总数增加约9460万人,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从49.1%下降到33.6%,涵盖下岗人员的调整城镇失业率从20世纪末的超过8%逐步下降到近年4%上下的水平。在正式职工工资持续上升的同时,农民工工资在劳动市场供求关系作用下快速增长,并持续出现“民工荒”现象。劳动市场多年“量价齐增”,意味着世纪之交严重的失业压力形势已逐步发生实质性缓和和改观,就业政策从侧重于数量扩张朝“数量与质量、速度与结构”并重方向调整。

第六,外部顺差失衡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教训。如何应对各类冲击维持开放宏观经济大致均衡是政策管理面临的难题之一。过去十余年中国开放宏观经济

经历的冲击类型与早先时期比较发生了重要变化。20 世纪 80—90 年代宏观失衡较多表现为短期货币和总需求扩张过快引发通胀,实际汇率被动升值销蚀外部竞争力并引入国际收支逆差压力,最后不得不实施对外贬值和对内紧缩组合措施加以调整。新时期却出现顺差失衡:在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提速背景下,钉住汇率制伴随汇率动态低估和外部竞争力“徒长”,“双顺差”扩大通过外汇储备资产过量积累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被动过度扩张,并为国内经济增速过快与偏热失衡提供了货币条件。需要加快推进汇率与利率市场化改革,更好地发挥价格杠杆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才能更好地防范与治理经济快速追赶时期开放宏观经济失衡。

第七,大国生产率追赶阶段更需防范资产泡沫风险。在生产率追赶背景下,新时期通胀的物价表现有一个新特点,就是在常规流量物价指数(如 CPI 或 GDP 平减指数等)上涨的同时资产价格(如房地产价格等)更是间歇性飙升。月度 CPI 同比增长率 2008 年 1 季度曾超过 8%,约一半年份 GDP 平减指数增幅在 6.7%—7.8% 较高位波动。然而,通胀压力更大程度上表现为资产价格飙升。如上证指数曾经从 2006 年年初的 1300 点飙升到 2007 年 10 月的 6250 点,商品房平均价格则在近十年增长了好几倍。物价上涨的结构特点与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有关:由于生产率追赶比较集中在工业制造部门,这部分物品供给弹性较高会抑制流量产出价格上涨,但这使得某些供给弹性较小的部门(如农产品)以及某些资产承受更大的价格上涨压力。在通胀环境下,不同流量和存量物品价格上涨幅度与各自的供给弹性大小成反比,现阶段中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较快追赶使流量物品价格上涨受到限制,货币过度扩张更容易引发资产价格泡沫与相应的金融风险。

第八,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化特点表明增长太快不划算。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贸易条件在波动中呈现显著下降趋势。除 2009 年外,2001—2010 年中国贸易条件持续下降,累计降幅 23%,年均下降约两个百分点。同时经验证据显示,中国贸易条件短期变动与国内宏观经济涨落存在显著关联,即货币和总需求扩张偏快会加剧贸易条件恶化,反之亦然。具体联系机制表现为:货币与总需求扩张导致进口数量上升,又通过“增量超级大国效应”推动进口价格相对上涨与贸易条件恶化。经济增长本来受到“过犹不及”均衡规律的制约,贸易条件与宏观涨落之间的联系进一步表明经济增长太快不划算。中国在经济最为快速追赶阶段难以完全避免贸易条件的不利变化,然而,宏观调控政策应力求防范扩张过快通过贸易条件加剧恶化。

第九,金融部门内部改革与外部开放需统筹兼顾、有序推进。用汇率折算美元衡量的中国储蓄规模已相当于美国的两倍多,如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升金

融系统配置国民储蓄效率,无疑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关键问题。中国现阶段金融系统改革与开放,大体可分为汇率与利率市场化价格改革、银行与金融机构放松准入并加强监管改革、资本账户扩大开放、人民币逐步承担国际货币职能等方面的内容。新时期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金融改革开放面临几方面的新挑战。一是汇率升值趋势使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在认识与利益上面临新困难;二是过多采用数量性调控工具导致金融抑制有增无减,并给金融改革造成新矛盾;三是危机后美欧零利率政策与中国比较正常的利率水平发生“常态性差异”,对资本账户开放构成新约束。直面现实新挑战,中国应将国内金融改革置于优先位置,同时稳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并顺其自然地积极响应人民币国际化需求。

第十,需深化改革以建构与开放型市场经济机制兼容一致的科学宏观调控体制。新时期政府重视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并取得成效,然而总体看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宏观调控对象过宽、工具过泛、部门过多、随意性过大等方面的问题。宏观调控政策与体制不完善相互影响和支持,不利于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实践经验表明,针对特定宏观经济形势选择具体宏观调控举措属于短期技术性问题,然而,宏观调控规则 and 对象范围的界定与宏观调控干预手段的选择,则在经济运行层面界定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真实边界关系,因而具有体制性和长期性含义。贯彻十八大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就需要在宏观调控对象、宏观调控部门、宏观调控工具等方面做“减法”,限制不同部门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实施形形色色的产业政策过多干预经济;同时要在加快汇率与利率市场化改革、提升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加快建构公共财政体制等方面做“加法”,使得总量和价格工具能够在宏观调控领域更充分、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四

本文集内容编排为九篇。第一篇的六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描述分析中国在全球经济范围内地位提升和影响力加大的基本事实。第一篇论文选取常规宏观经济指标,对中国经济相对全球规模“量体称重”,描述中国“人均量较小、总量较大、增量很大”的特点。第二篇至第五篇论文分别从中美失衡的镜像关系、中国因素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质疑输入型通胀判断、贸易条件变动“飞去来器”效应等方面,考察和强调中国经济的能动性 with 政策可选择性。本币国际化是大国经济追赶的题中应有之义,第六篇论文在考察近现代世界经济与金融史相关事实的基础上,从“追赶—危机—变革”角度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轨迹、经济逻辑与演变前景。

第二篇的八篇论文考察人民币汇率问题。1993 年周小川博士与合作者提出人民币汇率“先贬后升”推测,过去十余年中国经济运行现实展开“后升”轨迹时仍面临很大的争议与困难。本篇论文以经济追赶伴随实际汇率升值这个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命题作为基本视角,把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分析人民币汇率长期演变轨迹背后的客观规律,说明新时期升值趋势展开是中国开放发展阶段性成功的要求,政策上因势利导推进汇改利大于弊。前两篇论文考察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并提出人民币汇率之谜现象,第三至第七篇论文分别从两部门生产率追赶的国际比较、单位劳动成本与国际收支演变、体制转型因素影响等方面,对改革开放时期人民币汇率分阶段走势的特点提出逻辑一致的解释,把人民币汇率演变大势解说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故事。第八篇论文分析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超过万亿美元现象。

第三篇的四篇论文从开放宏观经济视角考察 21 世纪初中国劳动市场与就业问题。第一篇论文观察 21 世纪初中国劳动市场“量价齐增”即就业数量和工资水平双双快速增长的形势。第二篇论文从劳动市场的供给方面考察人口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与前景,并结合中国改革时期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经验证据,评论刘易斯拐点分析范式的积极意义与内在局限。第三篇论文观察新时期中国开放宏观景气增长的特征表现,在肯定其基本面条件与合理性因素基础上分析高速增长失衡因素。第四篇论文分析就业快速扩张与开放宏观经济不平衡的互动关系,并探讨宏观调控方针、劳动市场建设、就业方针等方面的政策调整思路。

第四篇的五篇论文研究开放型农业与劳动力转移方面的问题。第一篇论文从能源供求变化与粮食市场周期波动角度讨论 2008 年粮价飙升的原因,通过系统观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粮食市场演变大势,说明我们早已解决了以绝对短缺和匮乏为特征的传统粮食安全问题。第二篇论文研究比较优势与开放型棉产业发展,从开放经济整体运行效率角度分析中国入世后棉花超配额进口的经济合理性,考察棉花滑准税政策干预存在的问题。第三篇论文系统估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工工资变动轨迹,质疑“农民工工资 12 年仅增长 68 元”的流行观点。第四篇定量估计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未来 20 多年下降趋势的驱动原因。第五篇论文分析刘易斯拐点论暗含农业零值劳动假说,利用中国“大跃进”案例检验了这一假说。

第五篇的三篇论文考察中国资本回报率与合意投资问题。前两篇论文系统估测改革开放整个时期中国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的九个系列指标,发现 20 世纪末以来不同指标衡量的工业资本回报率普遍呈现持续上升趋势,说明 21 世纪初

中国开放宏观景气与投资高增长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其中第一篇论文荣获“第三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第三篇论文是笔者在“第三届张培刚奖颁奖典礼与中国经济发展论坛”上演讲的整理稿,进一步讨论资本回报率估测结果对理解中国投资高增长的认识价值及有待深入探讨的相关问题。

第六篇的三篇论文分别讨论 2009 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新时期宏观调控政策特点。针对当时的特殊形势,中国 2008 年年底推出一揽子刺激措施,很快推动信贷货币超常扩张与经济增速反弹,也引发通胀压力与后续相关风险。第一篇论文梳理截至 2009 年 2 季度宏观经济运行的表现,描述当时中国总需求 V 形回升的事实并分析其根源,提出需要警惕天量信贷扩张的后续通胀风险。第二篇论文系统梳理 1999—2009 年四轮产能过剩治理的政策实践,探讨以产能过剩治理作为宏观调控分析范式在学理与实践上的局限性,分析行政部门依据产能过剩判断频繁干预投资存在的矛盾问题。第三篇论文在系统观察 21 世纪初宏观调控政策演变的基础上,描述中国宏观调控工具多样化与产业政策宏观调控化等方面的特点,分析其利弊得失并提出改进宏观调控架构的思路。

第七篇的三篇论文侧重于讨论“扩大开放与金融改革”问题。第一篇论文“中国经济追赶新阶段与新经贸战略”是同名系列专题研究的主报告,在系统考察中国新时期经济追赶现实表现和演变前景的基础上,讨论以扩大开放为中心思路的新经贸方针。第二篇论文从人民币可兑换视角考察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与资本账户开放的内在逻辑和优先顺序。第三篇论文通过观察中国制鞋企业到非洲埃塞俄比亚投资的“华坚现象”,探讨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企业逐步向非洲转移的可能。

第八篇的五篇论文从不同侧面考察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美国与全球经济演变的特点。第一篇论文考察美联储危机前货币政策与次贷危机的关系,实证分析“格林斯潘做错了什么”。第二篇至第三篇论文分别考察 2009 年和 2010 年美国宏观经济形势与刺激政策的效果,分析后危机时期美国虽通过超常重手刺激避免了金融系统全面崩盘,然而经济运行难以避免地落入“复苏不易、景气难再”的困境。第四篇论文分析“金砖五国”合作的有利条件与制约因素,讨论“金砖五国”合作的四组关系和四种前景。第五篇论文考察近年全球经济面临减速的事实与根源,分析美国、欧元区、日本、主要资源出口国以及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形势特点,强调中国具有经济选择能动性,应趁势调整、力推改革、培育自主性景气增长基础。

第九篇介绍笔者从产品内分工角度对当代经济全球化时代特征与意义所做的一点理论性思考。当代中国经济开放发展的惊人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决策层制定改革开放政策以及中国人民努力奋斗,从外部条件看则得益于当代产品内

分工这一新生产方式的兴起。产品内分工将国际分工基本层次推进深入到特定产品内部的工序、区段和流程,为后进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分工并在竞争中提升结构提供了新的现实可能性。第一篇论文考察当代产品内分工的行业表现、利益源泉、产生根源等问题,阐述产品内分工的认识框架。第二篇至第四篇论文从不同方面讨论产品内分工对当代软件和服务外包现象的认识与分析价值。

五

今年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家发展研究院”(CCER-NSD)二十周年庆典,院领导鼓励大家整理发表学术著述以贺其事,为编辑出版本书提供了机缘。我才疏学浅,本书研究的涉猎对象广泛而复杂,分析内容和观点难免管窥蠡测甚或褊狭错谬。然而幸逢风起云涌的经济追赶大时代,直面恢弘壮观的重大经济现象,得工作之便能长期观察思考,竟也偶因一孔之见而窃喜自得。回想十余年研究过程以至近二十年在 CCER-NSD 工作的经历,我暗自庆幸并心存感激。

首先要感谢 CCER-NSD 朗润园工作环境给我提供的学习机会。尤其是近十年协调主持 CCER/CMRC“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学习领悟宋国青教授、周其仁教授精彩独到的经济思想和分析方法对我教益最大。有幸多次跟随其仁教授去外地考察企业和农村,得便“见习”他把经济考察和基层调研浑然天成结合起来的独特研究方法与“探查”功夫,不仅是特别开心愉悦的工作经历,更能经常得到“胜读十年”的宝贵启迪与感悟。非常感谢林毅夫教授 1994 年年底在北京大学老地学楼热情接待并与我长谈,用他特有的乐观主义气质鼓励我次年申请到中心工作;有机会长期就近观察领教毅夫教授非同寻常的经济思想,使我得到无数收获与教益。曾在或仍在朗润园工作的很多学长和同事,如易纲教授、张维迎教授、海闻教授、汪丁丁教授、胡大源教授、姚洋教授、陈平教授、张帆教授、平新乔教授、巫和懋教授、朱家祥教授、曾毅教授、黄益平教授以及其他同仁,他们各自的学养与研究专长使我经常受到启发和教益。

特别感谢学界老师和专家厉以宁先生、吴敬琏先生、茅于軾先生、张曙光先生、周小川教授、江小涓教授、樊纲教授、李杨教授、夏斌教授、陈志武教授、蔡昉教授、秦晓博士、梁红博士、谢平教授、徐滇庆教授、盛洪教授,我从阅读他们著述观点或与他们交流中获得各种教益和启发。我有机会通过承担研究课题,参加座谈会、研讨会或其他方式,与一些政府部门的领导交流探讨问题,对我而言也是难得的学习与领教机会。感谢财政部国际司和相关分管部领导、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司及相关分管部领导、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和相关分管行领导、商务部研究室和相关部领导等机构与领导给我提供的学习、交流、研究机会。因